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系统观念探析*

刘立 施天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合肥 230026)

[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着精深的系统观念,既论述了生态系统的要素、生态系统的层次、生态系统的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发展等自然生态系统论的主要内容,又阐明了治理主体实现整体治理需要优化结构的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的基本观念。这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系统观念; 生态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01-0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理解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须掌握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1]2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系统观念”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2]5-6}。系统观念是一种基础性、整体性、战略性、有序性的观念,在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系统观念具有更加深刻的寓意,蕴含了自然生态系统论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提出,要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3]33}。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运用系统观念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

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系统观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发挥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一、自然生态系统论

系统、要素和环境是系统科学研究的三大重要因素,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释了自然生态系统内外部的系统性,即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层次、存在的环境以及动态发展等方面都内蕴着鲜明的系统观念。

(一) 生态系统要素论

系统是若干要素及其关系组成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注重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分析,强调人、自然和社会等核心构成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土壤、水源、气候等资源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保障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必须始

*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13)。

[收稿日期] 2026-04-18

[作者简介] 刘立,男,湖北宜昌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执行院长。

施天天,女,安徽桐城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内生动力。从“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4]42}奠定了生态系统要素基本框架,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4]12}拓展了生态系统要素的维度,到“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5]71},再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4]198}进一步扩大了生态系统要素的包容范围,从而使生态系统这个“生命共同体”要素内涵不断丰富,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日益深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全面性和整体性的高度重视。由复杂多样、各种各类的生态要素构成的生命共同体积蓄着人与自然的系统关联和生态关联,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不仅将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自然要素纳入共同体中,而且将“天—地—人—物”等要素看作一个有机的大生命系统。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到“地球生命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承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和丰富了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思想。

(二) 生态系统层次论

按照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系统是有层次的。钱学森把整个世界从小到大划分为渺观、微观、宏观、宇观和胀观五个层次^{[6]30}。系统层次论强调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有序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微观领域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进而在国家层面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还扩展至全球视野“地球生命共同体”,从“要素—自然—地球”一体化视角,深刻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性,这“三个共同体”构成生态共同体理念。

从局部地段自然系统的构成要素来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并非孤立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由相互依存、紧密耦合的各环节构成的有机链条,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7]176}保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不能就山论山,就水论水,“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4]265}。“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7]176-177}。

从一国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系统论看来,人与自然所形成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不仅内蕴着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本质关系,还体现着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了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即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任何构成特定社会生命共同体的主体的基本义务之一在于内化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伦理准则,并将这种伦理约束转化为实践中的行为边界。具体而言,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及其代际可持续性,应当成为一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展开之前须先满足的先决条件。

从地球整体来看,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性与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深刻认识。这是针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负效应,以及损害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行为所造成的弊端而提出的正面引导。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各方面都与自然生物密切相关,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彰显了大党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是每个“地球人”的共同使命。

(三) 生态系统环境论

一定系统存在于环境之中。系统科学认为,任何系统都呈现出整体涌现性^[8],即系统的内在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具有新功能的新整体。系统产生整体涌现性的首要前提就是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形成耦合机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是持续不断的,不同的要素

结构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发挥功能,因此必须不断优化要素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生态环境系统从系统内要素的相互作用与调整来看,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演化的整体,需要不断调整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系统的最优运行状态。从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响应与适应来看,生态环境系统并非封闭的,而是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处于动态平衡中的复杂整体,其内部的生物、非生物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等各要素相互影响和作用,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适应环境变化。由于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环境的微小变化可能对整个系统产生显著影响。而面对环境变化,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组织性和恢复力。通过调整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恢复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然,这种适应性和恢复力是有限的,如果环境变化超过一定的阈值,生态系统就可能发生不可逆的破坏。

人类文明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每个阶段的环境中具有不一样的条件,在每个特定阶段的环境中也有特定的要求。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化对应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与确立,在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是明显的,人采取强制形式的征服力量给自然打上主观意志烙印,当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达到无法和解的地步,自然就会对人类的盲目自私行为加以报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559-560}。“自然界报复论”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有限性,警示人们盲目砍伐树木、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后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近期功利转变为负效应,甚至变为恶性报复,危害族群的生存与发展。

社会生产关系与政治上层建筑是规制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制度成因和系统环境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资本无限增殖贪

婪与自然有限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总根源。与之相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凭借其统筹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优越性,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提供了先进的制度环境保障。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施行完全的变革”^{[9]561},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是消除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实现的现代化,内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现代化路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优美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制度化推进构筑了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四) 生态系统发展论

系统是动态发展的。根据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系统的动态性就是“从时间维度来观察系统,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真正的静态系统是没有的”^{[6]32}。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作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论断,揭示了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态势。

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环境约束日渐趋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这些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发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有机统一体,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是并行不悖

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欲实现生态平衡和社会福祉的双赢局面必须以“绿水青山”为前提,守住发展的底线,坚决摒弃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定走绿色发展新路。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为根基的新形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客观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很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7]302}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以绿色为底色,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手段,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存,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石,是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人类生存环境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依靠制度保障,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依靠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是更高的民生需求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把握战略主动,将生态文明放在“国之大者”的战略位置。生态文明是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成为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奋斗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

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系统观出发指出,“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10]他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2]39}。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若干重大关系。

(一)治理主体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坚持党的领导和多方主体共治,注重“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4]285},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一,各级党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方向引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7]292}我国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则,加快立法、修法和废法步伐,完善生态考核体制机制,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发挥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块坚硬的钢铁”作用。

第二,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规划布局和宏观调控作用。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表,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在整合和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问题时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积极履行社会职能,平衡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引导传统产业改革升级,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第三,企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业应强化自身责任,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激励和倒逼企业自主推动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企业需要进一步通过研发和应用低碳技术,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科研攻关和创新应用,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应主动承担起资源科学开发利用、消除污染源、环境

综合治理等重要责任。

第四,社会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重要桥梁,能够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宣传上,社会组织积极做好示范建设的咨询服务工作,鼓励环保工作者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第五,公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力量。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单一部门或个人的努力不足以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7]176}我们必须坚持走生态文明建设群众路线,坚持绿色发展全民行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此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包括金融系统、军民结合等生态服务主体,各主体在动态互动中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

(二)治理整体论:构建文化体系、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制度体系、安全体系相融通的生态文明体系

整体性是系统的总标志,系统整体论是系统论最基本的观点。世界是一个包含多样性及各种关系形成的整体,必须将系统整体论应用于各个现实系统,重视整体与部分的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4]14-15}这体现了生态系统治理整体论。

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实现了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平等的生命伦理观的转变,将人、自然、

社会有机融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7]193}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实现绿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具体表现,实现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将生态资源进行产业化经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我国“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5]89},制定并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制度的刚性和权威保护生态环境。

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完善生态文明体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健全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尚不健全,“要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4]19},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生态安全体系是深刻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日趋频繁的人类活动正在持续逼近自然生态的既有边界,这一边界既

表现为可见的物理空间边界,也体现为不可见的生态承载红线与系统恢复边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国土空间管制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坚持“完善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明确生态红线,加快形成自然保护区体系,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在空间上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合理限定”^{[4]250},要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凸显生态安全对实现环境整体稳定的至关重要性。

(三)治理关系协调论:协调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不仅关注系统本身,而且关注系统内部包含的重大关系即系统中的内在关系。在我国整个社会系统战略布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2]6}。在我国具体生态系统建设策略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协调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等若干重大关系^[10]。

一是协调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不断塑造生态发展的后劲和潜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并非相互掣肘、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7]279-280}。

二是协调处理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国始终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牵住环境治理“牛鼻子”。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要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7]280}。

三是协调处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4]225}。在实践中,我们应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生态系统的具体状况、受损程度和恢复潜力等,优先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保护方针,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与修复能力。当生态系统受损程度超出其自我恢复阈值,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施分区分类施策的差异化管控策略,提高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四是协调处理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制性规范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驱动力是辩证统一的,常态化外部约束可以循序渐进转化为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则可以激发出遵守外部约束的主体自律,提升约束效果、减轻约束成本,取用有节、行止有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前提。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建立健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7]282},不断健全激励约束并重的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现代治理体系。

五是协调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战略使命,“双碳”目标给全球能源领域带来深刻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大国关系,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决不受他人左右。”^{[7]282-283}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下转第32页)

数智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创新： 生成动力与效能提升*

王遇见¹ 岳奎²

(1.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2.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数智时代,高校统战、社科联及科产教融合等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组织协调及激励保障。应以“数智+政治主导”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精准辨别是非的政治定力,以“数智+科技安保”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应对风险挑战的综合素养,以“数智+学科建设”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带头打造学科核心竞争力优势,以“数智+铸魂育人”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塑造高品格新质人才的使命责任,以“数智+参政议政”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协商的建言资政能效,以“数智+社会治理”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围绕中心大局的社会服务能力。力求在完善大统战工作体系格局中全面强化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效能。

[关键词] 数智时代;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 政治引领; 组织协调; 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07-1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1]29}要求。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既是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点争取对象,也是统战活动的重点服务对象和主要依靠力量。“十五五”期间,高校应组织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

动”^{[2]23}。面对数智技术引发的挑战及机遇,需要根据党的统战理论和政策,按照问题导向与数字治理相统一的原则,深入探讨如何利用数智赋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工作;应打破理论界不少学者对统战政治引领研究的抽象高调、不着边际、人为想象的局限,以数智与人文融合研究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创新;根据事物因果链循环规律,以高校统战、社科联、科产教融合等部门组织协调和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5VRC064),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暨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专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ZXZA039),江苏省社科联发展专项课题“数智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及组织协调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5GSB-006),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科研重点项目“数智与民族精神双重赋能高校高品格新质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5ZXSK0401002)。

[收稿日期] 2026-04-16

[作者简介] 王遇见,男,江苏阜宁人,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院、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岳奎,男,河南南阳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规划布局为依托,全力打造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的“生成动力—效能提升”一体驱动模型,增强对其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凸显创新性、系统性、科学性、实效性及前瞻性等特征。

一、以“数智+政治引领”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精准辨别是非的政治定力

数智与政治引领是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队伍建设的双重导向。政治引领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数智应用规定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数智技术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参政活动提供快捷高效手段。“十五五”时期,高校应以数智技术与政治主导的双向驱动,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增强精准辨别是非的政治定力。

第一,以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科技报国能动性。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3]党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使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是指具有本科学历和中级职称以上,与统战问题、统战活动、统战工作相关的,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工作的,在所在领域及所联系群众中具有代表性、有成就、有影响的共产党以外的知识分子^①。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党外知识分子都掌握先进的数智技术。数智的日益普及和深度发展,推动各行各业传统模式的快速变革,催动着社会制度的结构调整及高品格人才的开发利用。数智化概念通常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及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具有数据驱动、智能化决策、实时性、系统集成、用户中心、创新驱动及可持续发展等功能特征。数智网络会加速海量信息的挖掘、存储、识别、整理、调控及传播,作为知识精英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及所反映的思想、观点和立场,会通过全媒体联动及社交活动对高校、社会、政府及广大受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高校统战部应组织党外知识分子进行数智技能培训,引导他们进一步铸牢科技报国理念,提高数智素养。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性与数智工具理性增强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判断力。马克思主义批判理性是用科学的批判思维和怀疑方法重新审视一切,注重用辩证否定观看待历史及现实中的各种现象,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数智工具理性则注重技术工具对事物或现象加以智能识别、数据分析及图谱论证。马克思主义批判理性与数智工具理性相结合的过程,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补充的全面看问题的范式。高校应利用“数智+形势政策”,组织知名专家开展线上线下政治理论政策专题研讨会,将科学数据和数字信息融入政治理论政策的诠释中,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认同,强化国家立场、共产党执政理念、中央战略部署及宪法原则的思想共识,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以科学的“三观”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提高审时度势的政治鉴别力和免疫力。

第三,以“数智+‘五史’教育”提高党外知识分子政治领悟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奋斗进程中,积累了若干成功经验及挫折教训,成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策略和政治警示信息的重要渠道。利用“网络+‘五史’教育”数据库,通过学习中共党史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的奥秘,增强坚持共产党领导及长期执政话语体系的政治认同^[4];通过学习新中国史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跃升的发展规律及动力源泉,增强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通过学习改革开放史深刻理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创新必然性与必要性,增强破旧立新的革新意识;通过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规律,增强投身和服务社会主义

^① 此定义是基于以往知识分子界定,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及我们的2024年度中央统战部委托重点课题结项成果“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2024JSTZD008)。

大业的政治自觉;通过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凝聚的根和魂,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主体自觉。同时,利用统一战线史数据库,深刻理解协调处理统战领域政党关系、新的社会阶层关系、公有制与民营经济关系、民族宗教关系、海内外侨胞关系等方略,增强融入大团结大联合统战主题活动的参政自觉。在数字统战平台设置教学、理论研讨网页,鼓励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宣传党及统战工作的相关理论和政策,丰富和更新网络数据库资源,提高统战理论政策理解力和阐释力。

第四,以“数智+民主监督”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执行力。民主监督是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成员的重要职责。不少高校监督机制不健全,未能充分发挥大数据云平台的廉政监督和技术监测功能,而统战数据库积累了丰富的民主监督经验资料。高校可利用数智和调研手段挖掘、统计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参政的信息数据,制定针对性统战方案,对不同对象加以精准引导,提高遵章守纪的行为自觉,特别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对党政干部的民主监督职能,防范和抵制不作为、乱作为、滥用职权的干部腐败现象;调查社会重大问题、关注民生诉求,监督党政机构及干部对国家政策的执行落实状况,防止决策失误或误判误罚;鼓励和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同各种不法分子和不良社会思潮作斗争,同广大党员干部一道,共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合力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以“数智+科技安保”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应对风险挑战的综合素养

增强科技安保素质是发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科技创新作用的政治引领前提。“十五五”时期,面对国内外科技风险及社会风险不断加剧、数智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党委(党组)领导的统战主管部门应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则,建立数智赋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科技安全引领机制,增强其抗风险韧性。

首先,以“数智+风险防范”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增强科技产权保护意识。科技创新与科技安全相结合是数智赋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动力保障。近年来,科技赋能与科技风险交错并发。数智的日益普及造福社会,给人才培养及其价值发挥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也易引发日益增多的假冒伪造、科技滥用、信息泄露、学术腐败等侵占科技产权问题,扰乱社会秩序。针对数智时代大发展及引发的科技风险,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及地方统战培训机构应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探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数智培育与数智安全相统一的科技产权保护意识的培育路径,构建科技创新与科技安保有机结合机制,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增强抵御科技风险的能力,掌握科技产权真伪识别和风险防范本领,推进科技安保现代化。

其次,以“数智+思政工作”提高党外知识分子网格化管理效能。主体自主与组织协调相结合是凝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力量的组织基础。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既有内涵结构性变化的群体新特征,亦有不同个性及不同认知的差异化特点。高校统战部门应针对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看到党外知识分子密集构成学校统战工作重要阵地的特点,又看到党外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知识、素质及能力结构的差异性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的文化水平高而道德素质差,有的思想品德高而数智素养差,有的个体能力强而团队合作意识差,有的业务能力强而参政能力差,有的经验丰富而政见扭曲等。因此,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推进网格化管理,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本领,做党外知识分子的挚友和诤友;应发挥统战制度规范和党内知识分子的示范作用,做好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协调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其自律自省自觉,提高其对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政治认同觉悟;鼓励其严守国家科技机密,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抵制科技非法使用或不正当交易行为。

再次,以“数智+爱国意识”增强党外知识分子抗风险韧性。数智素养与爱国意识相结合是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队伍建设的重要内涵。为应对国际敌对势力对国内人才的渗透以及国内公共危机频发的风险,高校应在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培训工作中,推进数智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合,加强爱国主义理念对数智赋能工作的政治引导,使数智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加强爱国主义素质培育工作,优化科技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素质内涵结构,引导党外知识分子为统战工作智慧化、数字化转型和数智技术爱国化赋能;推进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引导党外知识分子自觉自愿投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业中;引导其严守国家机密,树立维护国家科技安全志向,坚持国格和人格的统一;逐步完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数据安全应用标准体系,使党外知识分子科技创新行为符合国家安全部法规,自觉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最后,以“数智+意识形态安全”构建以党内外知识分子为治学主体的党政教联动治校机制。党政教联动是提高高校党内外知识分子协同效应的制度保障。为应对社会多元文化对学生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复杂影响,需利用数智网络将高校意识形态党委主体责任与教授治学主体责任相结合,构建以数智网络为基础、党政为领导、教授为主体、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的高校意识形态大统战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党务、政务、教务高效协同配合,充分调动党内外知识分子协同治学的主体能动性,有效捍卫高校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三、以“数智+学科建设”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带头打造学科核心竞争力优势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打造专业学科核心竞争力的牵引功能优势。利用数智手段实现学科内涵建设及质量提升,是做好校内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政治引领要务。不同类型的学校具有不同特色的办学定位。深谙学校办学事务的党外知识分子是教育教学学科建设与质量评估的关键要素和领军人才,高校

党委统战部门应在“十五五”时期“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2]23},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利用数智技术平台参与学校管理、专业设置、课程规划、人才培养,充分发挥其学科带头人及治学主体的作用。

其一,数智时代呼唤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促进新质教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数智时代以创新驱动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在各行各业新质生产力深入发展,特别是科产教日益融合的背景下,广义的新质生产力主体已覆盖校内校外,不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作为成熟高端的劳动者直接参与校内外新质生产力的开发利用过程,已成为培育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5]。高校可组织党外知识分子及相关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协同利用数智通信等设备,深入探讨集聚先进教育要素、开发新质人才资源、增强学校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学科核心竞争力优势,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科技能力、科研成果及科学管理对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效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开发利用新质教育生产力,从而为社会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奠定智力基础。

其二,鼓励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推进教育数字化。数字化是将非数据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进行数字符号物化、转化、编程、加工、调控及重构。将数字化的虚拟经济融入实体经济,可形成数字产业化的数实经济;将数字化的虚拟教育融入办学布局,可形成教育数字化的智慧校园。为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2]41}的要求,高校应积极推进科技赋能和数字化转型研究,引导和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大数据、云平台、高端智库及多模态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教育资源数字化重构升级,根据学校特色、办学取向、科研及教育成效,完善办学资源数据库、建校历史档案馆和高端人才智库,为学校韧性治理、干部配备、人才使用、教学管理及规划布局等提供精准的数字信息和实证数据;将学生文

体活动、社团活动、志愿服务、学习能力、素质表现、成绩考核等数据情报加以储存、保护、建档,完善学生素质能力电子档案库,为校内外有关单位或部门及时提供就业推荐、人才供给、评优评奖等精准信息情报,在推进教育数字化与数字教育化有机融合中,加快教育事业现代化进程。

其三,尊重和维护高校党外知识分子首创精神。良好的激励保障措施是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创新价值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努力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生活创造更好条件。”^[6]^[4]高校党委统战部门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思想,坚持习近平有关党外知识分子重要地位的论断,充分尊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治国理政中的功能地位,在制度建设上,健全人才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党外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放手让广大党外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在工作环境上,遵循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减少对党外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让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于专业研究工作;在生活上,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沟通、协商、谈心,多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多帮他们消除后顾之忧;在绩效考核方式上,以充分肯定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及参政议政的特殊政治价值为导向,相应完善党外知识分子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在科研与教学待遇落实上,应完善按社会科学要素贡献分配的激励保障体系^[7],给予党外知识分子专项合理待遇,利用数智手段简化科研经费报销手续,兑现项目经费处置权,增强其可持续创新积极性,从而推进知识创新—评估—分配—保障的价值链优化和良性循环。

四、以“数智+铸魂育人”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塑造高品格新质人才的使命责任

满足国家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对优质人才的需要,是做好数智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核心要务。随着对外开放及网络

的畅通,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通过网络浸入校园,动摇学生理想信念和价值判断;不少高校存在人才强国战略使命落实不到位、人才有效供给不足、人才政治素质不高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现代化对多样性高规格新质人才的需求。具有杰出才华、德高望重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是学校铸魂育人的主导力量。在“十五五”时期,高校应在党委统战部门协调下,为党外知识分子构建社科联、科产教融合部门、教务部门、科研部门的联动机制,从政治引领目标上激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业务特长的自觉性,引导其积极投入立德树人工程,主动承担培育新质人才使命,带领相关专业教师共同推进教学范式及育才模式转型创新,同心协力为高品格新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做贡献。

一是以“数智+励志鼓舞”培育经世致用型新质精进人才。党外知识分子通常是对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有着深厚学识功底的高端人才。高校应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科技和信息技术,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中形成新创意、新场景和新业态;利用大语言模型基于算法、模型、规则,输入先进文化元素,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针对各类话题及词条进行深度分析,从多维度理性思考,在人机互动中理清思路,消解疑惑,对学习和工作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安排;利用VR、AR技术以虚拟与真实交融变换的多样性情境及红色文化沉浸式生态氛围,进行生动形象的潜移默化引导,增强英模精神和壮观场景的励志功效;利用互联网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利用“大思政”数据库引导学生辩证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消除思想误区,端正学习态度,在培育勤学苦练、勇于担当、为国分忧、为民谋福、学以致用、立志报国等精神中,造就经世致用型新质精进人才。

二是以“数智+心理调适”培育人格完善型新质生态人才。不少党外知识分子心理素质良好并掌握着尖端高新技术。学校可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类采集学生心理状况,对其心理情绪、心理压力、心理危机等问题进行识别、预警、调节和干预;

利用数智平台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多样性科技创新活动,在营造智慧校园和良好教育生态环境中提高学生参与数字治理能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输入 ChatGPT 系统,用人机对话和师生对话引导学生把握人生“总开关”,树立远大理想,增强抗风险韧性;利用数智化通识选修课及课程思政,培育学生良好的兴趣爱好及个性特长,从而形塑出专才与通才兼备的健康完善的新质生态人格。

三是以“数智+民族复兴”培育堪当大任型新质中坚人才。很多党外知识分子颇具民族复兴、爱国敬业的大义正气。高校可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民族复兴数据库及有关视频,引导学生反思和接受近代以来屈辱史教训;以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历史经验引导学生同仇敌忾、求同存异、广交朋友,聚力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以党的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强国战略及人才强国战略鼓励学生立志成才、忠心报国,努力把自己培养成适应国家战略需要的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质中坚人才。

四是以“数智+振兴中华”培育复合应用型新质实用人才。许多党外知识分子具有坚定的振兴中华毅力和斗志。学校可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数智手段带领学生深化民族精神标识研究,以此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激发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铺天盖地热情。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创造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已通过各种文化积淀形成数万种精神标识。高校可鼓励党外知识分子依据办学特色推行“数智+民族精神”模块研究,提高具有数智素养、良好品性、灵活变通及善于创新的新质学习力以及高效实用的新质行动力。如,工商企业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企业精神”,在探讨若干成功的上市公司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及精益管理经验中,提炼文化精髓,揭示提高新质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特有精神奥秘;公共管理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

公共事业精神”,在探讨典型的政府及公共事业单位利用数智技术提高新质公共事务协调力的经验中,揭示其值得弘扬的精神标识和社会价值;公益服务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公益服务精神”,在文化、体育、卫生、金融、交通等公益部门中选择典型单位加以考察,总结其利用数智手段提高新质公益分配力的经验,揭示其公益服务精神标识的生成逻辑及时代价值;市政工程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城市精神”,在探讨智慧城市提高新质市政规划力的文明创新经验中,揭示其现代文明城市建设精神标识及其韧性治理效能;旅游管理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山水精神”,在探讨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及新业态通过“双创”提高新质文旅智慧服务力的经验中,揭示其对山水精神标识的物化效应及人文效应;师范教育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学校精神”,在探讨不同类型学校建设智慧校园、提高教师新质言传身教力的经验中,揭示现代化的办学精神标识及示范引领效应。

五是以“数智+启智扬善”培育大智慧型新质拔尖人才。大智慧型新质拔尖人才是指那些拥有非凡聪明才智、深厚科学素养、卓越创新能力,并积极造福社会的出类拔萃人才。许多党外知识分子都是心地善良、乐于育人、灵活应变、智慧超群的教育家。在“十五五”时期,高校应进一步“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培育拔尖创新人才”^{[2]24}。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及广大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及历史唯物主义观引导学生端正思想观念,掌握辩证思维、系统思维与战略思维,将党中央的大政方略同世情、国情、行情相结合,增强历史使命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之大者”,致力于国家战略、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以求成为大视野宽胸怀新质人才;引导学生掌握网络思维、数字思维与创新思维,积极勤学苦练,增强才干,勇于挑战最前沿的课题,敢于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奉献精神,以求成为具有深厚涵养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大度量勇担当新质人才;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引导学生重民心、守诚信、勤助人,具备高尚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遵守科技伦理,追求社会公平和人类福祉,避免技术滥用,以求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善为高品性新质人才;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原则,引导学生用哲学思维、数智思维和立体思维既全面看问题,谋划协调整体战略布局和长期发展战略,又立足局部及近期工作重点,把握关键环节,兼顾个别利益,善于破危局、开新局、出奇招,机动灵活、从容应变、精谋良策,力求成为既善于顶层设计又精于求真务实的大格局善智谋新质人才;坚持“五爱”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爱心、重大义、讲和睦,全面提高情商智商,以求成为乐于大爱奉献的大情怀重操守新质人才。

五、以“数智+参政议政”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协商的建言资政能效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处理政党关系的新模式。“十五五”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可“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8]16},充分利用数智网络平台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学校应加大数智统战平台建设的投入,引导支持党外知识分子线上线下参政议政,提升学术与政治关联度,力求从政治引领的服务手段上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明理增信的参政议政能效。

第一,以“数智+人文引导”对不同政见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乐意发表思想见解。学校及地方政府党委及领导干部应坚持尊重特长优势与提高参政能力相统一的原则,善于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题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他们监督批评。只要其信息情报来源真实可靠,就要认真对待,择优采用,坚持在学术思想上“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有些党外知识分子基于自己的个性认知及民主党派立场,以及受网络流言蜚语负面影响,持有不同政见,对中央大政方针的真实意图和战略取向不一定把握得准,甚至有可能钻牛角尖,对此,应加强科学引导和规范

调控。在数智人文培训内容上,“要引导党外优秀人才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9],力求在“两个结合”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创新信息应用功力及中华传统统战文化“双创”能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传授,加强网络议政及统战信息处理的实操能力训练,提高参政议政水平。在工作方式上,学校应按照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基本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的基础上,增强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互信,在重大问题处理或重大决策制定之前,多征求党外知识分子的意见,多用有关规则加以引导,对其不当言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加以包容宽容,在求同存异中凝心聚力。在工作环境上,尊重和调动党外知识分子深入研讨统战理论政策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及时做好有关统战实践成效信息情报的发布与表彰工作,并鼓励支持政治原则性强的党外知识分子开讲坛和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统一战线学科前沿问题及社会热门话题,推进学术信息创新与交流,营造民主协商共治的良好学术氛围。

第二,以“数智+民主议政”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政效率。网络议政是发挥民主协商的重要渠道。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自主独立、层次高、影响大等特点,但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又会使其提供的信息呈碎片化状态,在提出消解社会问题或学校问题的意见提案或决策主张时,缺少全面真实的数据资料支撑,系统性科学性不够,难以形成精准规范有效的决策参考论证,以致出现参政提案、意见精准度及实效性不高的反差。高校统战部门应配合政府统战机构共同为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公共治理、数据监测、网络议政等提供便利条件,完善统战图书情报等网络数据库支持体系,鼓励其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参与决策、民主议政、民主监督等活动,发挥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8]15-16}的功能。鼓励党外代表人

士利用自身特殊身份深入实际开展专项调研,了解有关重大事件或案情发生的原委经过,监督审核案情处理程序及社会反响,防止冤假错案伤害无辜,以致引发民愤和社会混乱;通过政协或网络等渠道反映代表真实民意诉求的可靠数据,建立建言资政质量检测评价体系,利用大数据、云平台、智能识别手段审核网络参政建议及政协提案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为化解民意诉求和社会难题、制定科学决策提供最佳可行适用的方案;相关部门可依托平台迅速响应和反馈处理,加速建言献策落地生根,形成双向良性互动效应。如在2026年3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期间,许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及社会民主人士通过网上网下渠道提出大量合理化建议。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自2026年3月4日开幕以来,来自34个界别的2000多名政协委员深入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截至3月5日20时,共收到提案5865件。经过数字化智能化识别处理及专业审查,立案5005件,并案451件,转为意见和建议409件。^[10]从而为党政机构及司法机关的科学决策报送了重要数据来源和真知灼见。

第三,以“数智+党政联席会议”助推高校党内外知识分子协商共治。党政联席会议是就有关单位或部门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事项,召开由党委或党支部、行政部门、员工代表组成的扩大会议,商讨重要对策。高校党委统战部门可依据“大党建”的内涵要求、历史使命及政治取向,支持各院系经常性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重要问题、事项和决策共同协商处理,组织党内外知识分子共同参加党的理论政策及统战理论政策的学习、研究及主题活动,既保障党外知识分子自主创新活动和社交活动,又组织其参与校内外群体活动,协调其与有关部门或单位的合作交流关系,通过学校统战体制机制创新和效能建设管理,推进数智与思想政治引领双重赋能,为党外知识分子发挥参政议政才智提供必要的科技手段、信息服务、助手协作、经费配套及物质保障等条件。

六、用“数智+社会治理”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围绕中心大局的社会服务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战工作的重要职责。高校应利用统战智力优势切实履行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的职能,从政治引领价值上凸显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才智社会化效应。针对许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自主创新多而与企业合作少,社交档次高而对基层社会问题关注少,学科专业影响大而对科产教联动少等局限,在“十五五”时期,高校科产教融合部门及社科联组织应坚持人才创新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原则,依据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及教育数字化的国家战略需求,积极与政府及地方有关企事业单位协调沟通,探讨发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对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社会化服务的智力支持与协作创新策略。

其一,以“数智+统战体制改革”完善高校党内外知识分子大统战工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6]138}党中央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高校应以线上线下综合议政为抓手,真正把聚智咨政的统战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党政领导班子工作考核体系、党委统战部门宣传工作计划及学校发展规划中。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智力超群、社会活动能力强,能够成为连接党内外领导机关及校内外人员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可发挥其决策“智囊团”和协调社会关系的“粘合剂”功能。高校党委统战部门应在推进统战工作由传统系统内向系统内外联动的“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将数智技术与新发展理念嵌入大统战工作体系,推进统战高质量发展;既鼓励共产党员及干部在统战机构中兼职,推进智慧党建落实到基层统战领域,提高其政治凝聚力和引领力,又鼓励作为参政党代表人士的党外知识分子在校内外党政机构中兼职,开展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主题活动,积极配合党政机关干部共同做好统战工作、群

众工作、思政工作、社会协调与公共治理工作,增强经济社会韧性和活力。

其二,以“数智+社交活动”构建高校内外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联谊交友机制。不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同校内外、国内外的其他知识分子关系生疏,沟通交往不畅,联谊交友的活力和动力不足,未能充分调动其参与统战活动的积极性。因而学校统战部门应深入探讨如何将校内外、党内外、体制内外及海内外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探索开展统战事务—学校事务—社会事务—资政事务一体推进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3月4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党、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指出:“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6]143}高校统战部门应吸收更多的党外知识分子加入“知联会”,开展有关组织活动,发挥“雁阵效应”;以高校党委统战部牵头成立并配置好组织协调机构,发挥网络统战社交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统战社交活动及多样性群体文艺活动;以“网络+校友会”开展海内外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活动及其他多样性统战文化活动,利用党外知识分子的海外关系和国际知名度,引进国外先进人才、先进技术和社会资本,服务我国地方现代化建设和合作办学。

其三,以“数智+科产教融合”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引领和服务社会的特长优势。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6]133},能够发挥人才的“第一推动力”功能。高校统战部门及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科产教深度融合的牵线协调服务,发挥高校及党外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职能,推进产学研政合作,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赛道;应“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2]24};应为党外知

识分子提供必要的创新创业平台及更多的项目研究机会,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发挥科技驱动发展功能,推进科技产权转化试点,打造创新创业新品牌,展示其对社会相关行业的示范引领效应;发动和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带领团队开展国家和社会重大难题的合作攻关,为国家治理及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也鼓励其参与地方项目横向合作,用先进科技帮助地方单位或部门解决平台建设和发展瓶颈问题;鼓励他们通过在线协作平台、虚拟实验室和远程研究项目,突破地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施多样性多层次的协作创新,充分发挥科研和人才引领社会、服务社会的辐射效应。

其四,以“数智+社会整合”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地方治安及现代化建设的效能。社会资源整合是任何执政党的重要任务。博学多才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优化整合社会资源及教育资源的能力。受近年来疫情蔓延及经营模式转变影响,许多企业不景气,劳资矛盾加重;各种交通事故频发,火灾、水灾、旱灾交替出现,群体性斗殴等社会问题突出,社会治理难度明显加大。对此,高校需要探讨激励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带头优化配置国家及地方资源、推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路径,在科技与安全平衡、活力与秩序统一中增强新质生产力韧性;鼓励他们利用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手段,实时了解和追踪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的情报与态势,“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2]49-50},增强基层治理韧性;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人才创新深度融合中培育发展新动能,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推进经济社会数实融合与可持续发展的实效长效价值。

总之,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居于核心竞争力关键地位的人才竞争。世间最宝贵的财富并非所有人,而是具有创造优质财富能力的人才资源。高校是高智力人才密集的地方,党外知识分子成为高校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尽管许多高校已引起重视,但相较于

“十五五”时期面临的风险挑战、发展机遇及更高的统战使命而言,仍存在许多短板。高校具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的四重职能,与之相应,作为高校治学主体的党外知识分子亦可承担多重重要职责,需要高校有关部门加强协调组织、政治引领和数智赋能。一是针对许多从事统战工作的单位或部门基础理论研究能力不足问题,高校可借助项目招标或课题委托等形式,进一步鼓励党外知识分子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参与统战问题、理论、政策研究。推进统战工作经验理论化制度化跃迁,在深化统战理论政策及学科前沿问题的内涵逻辑与实效对策研究中,推进统战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先进智力引领功能,推进统战体制机制及大统战工作体系格局的完善发展。二是针对许多统战部门及单位滞后于数智快速发展的进程、参政效率不高的问题,高校应进一步加大数智信息平台建设的投入。支持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利用数智信息软件及网络议政调研数据或参政建议,进行数字转化和识别研判,提高参政精准度及决策信度和效度,同时推进数字普及和科学普及,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科技驱动发展功能,加速推进学校及社会文明进步。三是针对社会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国家人才战略对高校高品格新质人才的迫切需要,高校应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党外知识分子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创新的积极性。鼓励其积极参与教学体制改革、现代化教学范式创新、教育数字化建设,充分发挥其铸魂育才专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塑造和提供更多的优质生力军。四是针对现实中产学研力量比较分散、科研转化率不高的问题,政府统战部门及高校等有关企事业单位应进一步加强协调牵引,以党外知识分子为社交网络节点,深度构建科产教融合及职教融合机制。鼓励学校党外知识分子发挥学科带头作用,积极承担政府部门或有关部门的纵向和横向项目研究,带

领团队对国家及社会重大重点难题进行协作攻关,并利用数智技术进行科学验证,为政府部门及有关单位提供精准可靠的问题数据和决策提案,推进科研成果社会化及知识产权转化,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科研转化创新功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及社会建设的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3]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EB/OL].(2018-05-02)[2026-02-08].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5/02/content_5287554.htm#1
- [4] 王遐见,岳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话语体系建构逻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3):1-11.
- [5] 杨洋.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境遇与实现路径[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1):89-96.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7] 王遐见.新时代激发人才创新动力的按社会科学要素贡献分配机制[J].社会科学家,2019(1):128-137.
- [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
- [9]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EB/OL].(2015-05-18)[2026-02-16]. <https://baike.so.com/doc/25801711-26941677.html>.
-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关于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EB/OL].(2026-03-11)[2026-03-18]. <http://www.cppcc.gov.cn/zxww/2026/03/11/ART11773230210484637.shtml>.

(责任编辑 师 语)

人工智能赋能新兴知识分子队伍建设： 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

孙运军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政策教研部, 山东济南 250012)

[摘要] 当代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内涵结构、政治态度、政治参与意愿等发生了新变化,需要我们深刻认清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复杂态势,系统梳理人工智能革命对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提出推进有效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的对策,以期为进一步做好新兴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发挥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 人工智能革命; 新兴知识分子; 政治吸纳; 组织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17-09

一、问题分析和研究意义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对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乃至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还深刻影响了政治格局与治理模式^[1]。这场变革不仅重塑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群体与政治角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这一群体不仅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在政治参与、社会治理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如何有效地将这批新兴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实现其政治吸纳和有效组织,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新兴知识分子”并非一个有着绝对统一、一成不变定义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演变。在今天,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AI时代的新兴知识分子具有突出特质:一是高度的跨界融合性。他们往往是“T型人才”,既在

某一垂直领域有深度,又广泛涉猎技术、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二是实践导向与工具性。他们的知识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力和解决方案,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结合更为紧密。三是动态演进性。由于AI技术迭代极快,他们必须保持终身学习,其知识体系和技能需要不断更新。四是深刻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并存。他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其发展方向的思考者和批判者,肩负着为智能社会奠基的重任。我们可以将“新兴知识分子”理解为:在每一次重大技术——社会范式变革中,凭借其掌握的“新兴关键生产资料”(不限于物理资本,更侧重于知识、技能和数据),在思想、文化、科技和经济领域产生主导性影响的社会群体。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新兴关键生产资料”。在农业时代是土地,在工业时代是资本和工厂,在信息时代是知识和信息,而在智能时代,则演变为数据、算法和算力。在此背景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5VRC064)。

[收稿日期] 2026-04-26

[作者简介] 孙运军,男,山东临沂人,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政策教研部副教授。

下,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使命提出了新的要求^[2]。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新兴知识分子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愈发凸显,他们不仅是科研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者,更是科技伦理守护者。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新兴知识分子更多地依赖于技术手段来实现社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社会角色定位以及责任担当方式均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如何引导和支持新兴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中发挥积极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在人工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问题显得尤为紧迫。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支持,归国知识分子无疑是这一领域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在政治态度、价值取向上与本土知识分子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为政治吸纳和组织建设带来了挑战。部分归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无兴趣,他们更倾向于专注于科研工作,对政治活动缺乏热情;一些归国知识分子担心政治组织会影响科研工作,认为党内活动会占用大量时间,影响科研进度;部分归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有情感认同,认为加入民主党派能够获得更自由的时间支配和更快的政治晋升^[3];还有一些党组织在归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领手段,导致归国知识分子对党的认同度不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就业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包括归国知识分子在内的新兴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将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将该群体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不仅关系到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全局,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问题,有助于深化对政治吸纳机制的理解。政治吸纳是指执政

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将社会精英纳入政治体系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吸纳主要针对的是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研究他们的政治吸纳问题,可以为现有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理论提供新的视角,丰富和发展政治吸纳理论。

从实践层面来看,研究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问题,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例如,通过政治吸纳,可以将这部分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国家的重大决策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通过组织化的决策参与渠道,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

研究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问题,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更加多元化。然而,这一变化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数字鸿沟、技术失业等。通过政治引领和组织协调,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例如,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参与公益事业,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构成及特征

新兴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社会角色等核心特征,不再仅仅是“有知识的人”,而是“能够创造、驾驭并批判性地引导下一代核心生产力(AI)的人”。他们是一个多元、动态的群体,共同构成了塑造我们未来社会形态的中坚力量。界定他们的,不是文凭或职称,而是他们在AI生态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及其所掌握的“智能资本”。这一群体不仅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且在社会文化变迁和政治生态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关于新兴知识分子功能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尤其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劳动不仅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且是社会关系变迁的根本动力。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崛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为我们理解新兴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角色和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4]。在马克思时代,机器的使用使得劳动力实际隶属于机器,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被替代的趋势,非物质劳动兴起,知识商品化新形式不断出现。尽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取代了许多就业岗位,但也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5]。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机器大工业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指出机器的引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导致了劳动者的异化和剥削的加剧。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理论仍然适用^[6]。新兴技术的应用,如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也可能导致大量劳动者失业,尤其是那些从事重复性、低技能工作的劳动者。新兴知识分子作为掌握新新技术和新知识的群体,应当承担起引导技术合理应用、减少技术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的责任。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新兴知识分子不仅应当关注技术的发展,更应关注技术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影响。他们应当积极参与对平台资本主义等当代特征的社会批判,揭露技术进步背后的资本逻辑,推动技术成果惠及更广泛的民众,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这意味着新兴知识分子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仅要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更要关注社会公平

正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教育和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呼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教育和宣传增强阶级意识,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在人工智能时代,新兴知识分子应当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普及科学,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同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支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也有利于构建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新兴知识分子国际政治角色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指出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了国际的不平等和冲突。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技术的全球共享,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特别是在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时,新兴知识分子应当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二) 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教育背景来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留学归国人员、高新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跨学科研究者构成。他们在教育背景上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体现在国际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背景上。

留学归国人员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人群通常拥有海外知名高校的教育背景,接受了先进的科研训练和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他们的回归不仅带回了前沿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带来了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这部分人群的入党积极性相对较低。以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为例,2013年以来,该所共吸引了13位留学归国高级知识分子入所工作,其中党员7位,党员占留学归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比例为

54%。尽管这一比例较高,但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党员中大多数是在归国前就已经入党,归国后入党的仅占一小部分^[3]。这表明,尽管他们在专业领域表现出色,但对国内政治组织的认同和参与仍需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留学归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的比例远低于国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比例,反映出留学经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国内政治组织的认同感和参与意愿。

高新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些人通常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跨学科研究者的增多也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增添了新的活力。这类人群通常具备多学科背景,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交叉融合,推动创新。然而,他们的多元背景也使得他们的政治认同需要更加开放包容的环境。

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职业分布来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为新兴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数字经济领域的职业分布尤为突出^[3]。数字经济是指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的经济活动^[7]。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8]。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掌握了先进的数字技术,还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大数据分析师、人工智能工程师、区块链开发者等职业,都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各领域的职业分布也值得关注。他们不仅参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还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生物技术研究员、新材料科学家、新能源工程师等职业,都是科技创新领域的核心岗位。这些职业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深厚的专业背景,还需要他们具备跨学科的综合能力,能够在复杂的科研环境中开展创新工作。

现代服务业的职业分布也呈现出新的特点^[8]。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领域中的职业选择也日益多样化。例如,金融分析师、市场策划师、品牌经理等职业,都是现代服务业中的热门岗位。这些职业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他们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创造价值。

当代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职业选择更加倾向于那些能够充分发挥其知识和技能优势的领域。例如,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职业,都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热门选择。例如,促进了工作方式的个性化和定制化,在创意产业,智能设计工具能够根据设计师的创作风格和项目需求,生成初步的设计方案,大幅缩短了创作周期^[9]。显而易见,新兴知识分子特指那些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拥有深厚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知识精英,广泛分布在新经济、新技术领域中,包括但不限于归国学者、科技创业者、互联网精英等科研人员、工程师、IT从业者、金融分析师等。这些职业不仅能够满足他们对自由和创造力的追求,还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

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倾向来看,这一群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会影响到体制效能的整体发挥。

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个人主义倾向源于其高度的专业化和独立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这要求知识分子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他们往往倾向于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技术突破,而非集体行动。这种个人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政治问题时,更愿意以个体的身份发声,而不是通过集体组织来表达意见。例如,许多技术专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见解,但很少参与正式的政治组织或团体。

个人主义倾向体现在新兴群体对政治参

与方式的选择上^[10]。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政治参与通常需要通过政党、工会等组织进行。然而,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新型渠道参与政治讨论和活动。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参与门槛,也使得个体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观点。然而,这种分散化的参与方式缺乏组织性和系统性,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影响力。例如,许多技术论坛和在线社区虽然活跃,但很难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

个人主义倾向还影响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化水平。由于个人主义倾向,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组织化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他们往往缺乏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难以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他们对组织的依赖性较低,更愿意以个体身份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种低组织化水平使得他们在面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时,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和行动,从而影响了其整体的社会政治效能。

在政治参与方面,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面临一定的挑战。如对政治无兴趣、担心加入政治组织影响科研工作、对民主党派有情感认同,以及部分党组织在归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不到位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更深层次的政治参与^[3]。因此,党组织在吸纳归国知识分子时,应当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采取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策略,以增强其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实现归国知识分子从爱国到爱党爱国的提升。

三、人工智能革命对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和组织活动的影响因素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政治参与变化虽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技术工具(互联网、社交媒体),但当信息技术影响到制度适配、冲击文化传统、改变权力结构等社会因素的中介作用就会显现,这些会成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和组织活动的影响因素。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发挥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优势与作用,

并克服有关负面影响问题,将是促进这一群体队伍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人工智能信息化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问题

主要是政治冷漠与参与障碍。政治冷漠与参与障碍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智能革命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更关乎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11]。

政治冷漠并非单纯由个体性格或态度决定,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新兴知识分子而言,政治冷漠的根源之一在于对政治体系的信任缺失。部分归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无兴趣,认为无论哪个政党都与其无关,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对现有政治体系的疏离感。此外,部分归国知识分子担心加入政治组织会影响科研工作,认为党内活动较多,需要占用大量时间,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抵触情绪^[3]。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参与被视为一种负担而非权利,导致政治冷漠现象的产生。

政治参与的障碍也很明显。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尤其是对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通过非传统的途径表达意见,如网络平台。然而,这些途径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到严格的监管,限制了他们的政治表达。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新兴知识分子的需求和特点,如民主党派对党员的时间要求较为宽松,吸引了部分寻求更自由支配时间的知识分子。这表明,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需要更加灵活和包容,以适应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二)人工智能信息化给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参与渠道,这一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化问题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更加凸显。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的普及,使得这一群体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观点,参与政治讨论^[12]。这些平

台不仅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提高了参与的效率,还增强了政治参与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例如,通过在线投票系统,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可以方便地参与各类选举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偏好,从而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12]。大数据技术的引入使得政府能够基于海量数据进行科学决策,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政府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众需求,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政策响应速度^[13]。此外,大数据技术还促进了政务公开透明,增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为公民参与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效能感。这一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化问题与政治参与动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信息时代,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能够通过网络获取丰富的政治信息,包括政策、新闻报道、专家评论等,这有助于他们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政治认识。同时,网络平台上的政治讨论和交流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政治过程,提高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意愿。此外,通过网络平台,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还可以直接与政治人物进行互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种直接的沟通方式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即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根据已有研究,人工智能不仅替代了低技能劳动,也开始逐步影响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作^[14]。这种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虽然短期内可能增加结构性失业,但长远来看,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向更高层次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教育和培训,失业劳动者可以转向新兴行业,从事更加复杂和创造性的劳动。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失业问题,也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增强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治的动力。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还促进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的多元化。这一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化问题与公民社会共识的形成紧密相关。除了传统的选举投票之外,新

兴知识分子群体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如在线请愿、电子签名、网络抗议等。这些新的参与形式不仅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内容,也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渠道。例如,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起在线请愿,收集公众意见,向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他们不仅利用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等手段开展社会调查和项目评估,为政府提供独立的意见,促进政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进行政策研究和分析,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和决策过程。例如,通过在线论坛、社交媒体等平台,新兴知识分子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其他公民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流,形成多元化的意见市场,公民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涌现。

(三) 新兴知识分子彰显民主政治建设参与者的优势与作用

在人工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将继续发挥其作为民主政治建设参与者的优势与作用。

1. 新兴知识分子是社会监督的践行者。新兴知识分子在社会监督中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信息的分析者与传播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的数据和信息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乏虚假、误导性信息。新兴知识分子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能够有效地筛选、分析和解读信息,帮助公众辨别真伪,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他们通过撰写评论、发表研究报告等形式,向公众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引导舆论走向,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

二是社会问题的发现者与解决者。他们利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深入探究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例如,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领域,新兴知识分子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提出解决方案,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

据,增强了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是社会监督机制的构建者与参与者。在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新兴知识分子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参与社会监督机制的设计与完善,还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例如,在网络监督、媒体监督等方面,新兴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到监督活动中,提高了监督的效果和影响力。同时,他们还致力于提升公民的监督意识和能力,培养更多的社会监督力量,共同构建一个开放、透明、公正的社会环境。

2.新兴知识分子是公共议题的倡议者。在公共议题的倡议方面,新兴知识分子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能够在促进社会共识、推动政策制定及实施、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兴知识分子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探索,为公共议题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诸如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先进工具的应用,使得新兴知识分子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社会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根源,为公共议题的形成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在社会不平等问题上,通过分析大量社会经济数据,新兴知识分子能够揭示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机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新兴知识分子在公共议题倡议中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角色,连接着学术界、政府决策部门与普通民众。他们不仅能够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易于理解的语言,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社会问题,还能够通过撰写报告、发表文章、参与公共讨论等方式,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行动指南,促进社会各界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和支持。

新兴知识分子在倡导公共议题时,还需注重跨学科合作与国际交流。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社会问题,单一学科的知识往往难以全面解析问题的本质。因此,新兴知识分子应积极寻求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合作,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界

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变得更加便捷,新兴知识分子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国情,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公共议题倡议方案。

3.新兴知识分子是法律公正的支持者。新兴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法律公正的倡导者。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过程中,数据隐私、算法偏见、责任归属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不仅挑战着现有的法律体系,也对社会公平构成了潜在威胁。新兴知识分子应通过学术研究、公共讨论等方式,揭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确保技术发展不偏离法治轨道。

新兴知识分子还应扮演法律教育者的角色。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普通民众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新兴知识分子应通过撰写科普文章、举办讲座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同时,新兴知识分子还应关注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培养下一代具备良好的法治观念,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四、进一步完善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安排的机制

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认同、组织管理、伦理责任等多个方面。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群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一)实效化对策:构建创新激励与人才保障的体制机制

第一,探讨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吸纳过程中的动力机制。政治吸纳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过程,而是需要双方的互动与配合。对于新兴知识分子而言,政治吸纳的动力可能来源于国家发展的责任感、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期望、对社会地位的认同等多方面因素。应深入分析这些动力机制,特别是如何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增强新兴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其积极参与国家政

治生活。

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问题涉及如何构建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合作机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成为必然趋势。这不仅要求技术专家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通过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创新平台,可以促进知识的共享与交流,增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外,组织化还意味着需要建立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确保组织运行的透明度和民主性,防止技术精英主义倾向的出现。

第二,关注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组织化过程中的障碍与挑战。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吸纳过程中面临着身份认同与角色定位的挑战。一方面,他们是技术创新的先锋,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需要面对来自传统政治体制的接纳与认可问题。这要求他们在保持专业独立性的同时,寻找与现有政治体系的有效对接路径。例如,通过参与政府咨询委员会、智库建设等方式,新兴知识分子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同时也能够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

第三,加大国家层面的支持与引导,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制度环境。尽管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吸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少障碍。研究应探讨这些障碍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如通过优化党组织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减轻科研人员的负担,增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政府下一步应当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新兴知识分子参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决策过程,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平台。此外,研究还关注不同地区在吸引和组织高层次人才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的效果和适用性值得深入研究。通过国际比较,可以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借鉴,尤其是在如何平衡国家需求与个人发展、如何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制度环境等方面。

(二)系统化对策:营造政治引领与政策配套相结合的良好环境

应加强政治引领,为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化提供方向指导。对于归国知识分子而言,虽然他们在海外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和科研训练,但对国内政治环境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当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和历史教育,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增强他们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注重将党的理论与科技发展相结合,使他们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坚强保障。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便捷的学习资源,方便科技人才随时随地学习。

应构建适应科学家工作特点的党建体系,推进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化健康发展。通过总结山东大学等高校统战工作与党建融合的实践经验,建设一支熟悉科技工作特点的党建专业队伍至关重要。选派对科技领域有深入了解、具备较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党员干部,担任科研院所、高校的党委(党组)书记,确保他们能够与科技人才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关切,解决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支队伍还应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动员和组织科技人才积极参与党的各项活动,增强他们的组织归属感。

应改进和完善科研院所、高校的党建工作方法,使之更加贴近科技人才的工作实际。摒弃形式主义,注重实效,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富有针对性的活动,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例如,可以定期举办科技论坛、学术沙龙等活动,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同时,建立健全服务机制,关注科技人才的生活需求,如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科研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科研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战略科学家,应给予重点关注和支持,通过建立专门的联络机制,定期交流思想,分享研究成果,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化的实施。如在《科技进步法》中增设知识分子等科研人员的政治参与条款。政府应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资金支持、项目资助等,鼓励和支持归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其专业特长。同时,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归国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在政治吸纳方面,可以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如设立专门的咨询委员会、邀请归国知识分子参与政策制定等,使其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到国家决策过程中,增强其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应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为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化激发生机活力。应构建一个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倡导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尊重差异,鼓励交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这不仅需要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还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对于突出的科技人才,应当给予相应的荣誉和奖励,树立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科技人才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应建立与海外科技人才有效联系渠道,扩大党的影响力。通过设立海外联络站、开展国际交流等方式,加强与海外科技人才的联系,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对于有意归国发展的科技人才,应当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包括职业发展规划、科研条件保障等方面,吸引他们回到祖国,为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力量。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增进国内外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注重培养归国知识分子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代表中国发声,提升国家软实力。

[参 考 文 献]

[1] 蒋南平.人工智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映射及其政策价值[J].人文杂志,2019(2):20-25.

- [2] 陈氟.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人工智能参与社会实践的规则冲突——以人工智能辅助驾驶中的行动困境为例[J].学习与探索,2025(6):83-92.
- [3] 聂常虹,张志明,马丽.加强归国知识分子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问题的思考——基于对部分科研院所归国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的调研[J].中国人才,2019(10):39-42.
- [4] 刘海军,王玉华.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发展观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J].理论学刊,2023(1):91-99.
- [5] 陈韦宏,罗志佳.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者的困境与纾解——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经济学家,2025(2):26-34.
- [6] 薛峰,何云峰.科技进步、人工智能与劳动发展——第四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关于科技与劳动发展关系的学术讨论综述[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1):208-212.
- [7] 黄庆平,张振华,吴轲威等.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演进与青年职业发展[J].中国青年研究,2022(9):114-119.
- [8] 戚聿东,丁述磊,刘翠花.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促进专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基于社会分工视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8-69.
- [9] 聂文琪.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的产业变革、就业影响及应对策略[J].湖北社会科学,2024(8):90-103.
- [10] 侯东德,薄萍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吸纳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4):85-90+147.
- [11] 聂骝,范广军.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选择性冷漠症探源与对策[J].学习论坛,2017(10):54-58.
- [12] 冉飞.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6(17):65-67.
- [13] 王山.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创新[J].求实,2017(1):51-57.
- [14] 张晋铭.以人工智能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21(12):78-88.

(责任编辑 王遐见)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孔 读 云

(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2)

[摘 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催化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发挥政治凝聚功能,构建了共同的“政治认同”;通过发挥文化整合功能,塑造了抗战时期共同的价值导向;通过实践锻造,强化了全民族命运共同体认知。中国共产党通过始终主动自觉的思想引领,促使中华民族在认知、情感和实践方面全面觉醒了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凝聚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精神动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基础,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26-07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觉醒,在抗争中奋起,最终形成强大的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民族自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1]这个历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发展和全面觉醒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关键因素。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发挥其独特的政治凝聚、文化整合、实践锻造和思想引领功能,促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摒弃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之别勇敢站出来,同仇敌忾,荣辱与共,精诚团结,共同抗日,铸就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民族大团结、彼此共存亡的命运

共同体局面,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最为可靠的基石,最终“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2]364}。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历史,也开启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萌芽到形成的历史进程。面对空前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阶级矛盾下降成为次要方面。因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中华民族大局出发,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就发布宣言,号召国人起来抗战,并委派优秀党员前往东北组织抗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行径使得抗战力量被白白消耗。

随着东三省沦陷和“华北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的政治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

[收稿日期] 2026-02-10

[作者简介] 孔读云,男,安徽舒城人,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2]143}。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清醒判断和政治立场都是非常明确且一贯的。1935年《八一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3]265}的主张。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2]152}。与此同时,面对整体性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以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主动请缨出战。此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看到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无不义愤填膺,一二九运动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高潮。1930年5月“蒙古会议”提出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重要命题在民族危机面前越来越成为民族共识并得以强化。

西安事变是国共两党抗日态度“从分歧到弥合”的历史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是两大政治力量在民族危机面前的坚持与妥协,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次在最高政治层面获得了实质性共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2]363}。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从此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2]344}再次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御辱。随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三项基本主张,做出了四项郑重承诺。面对抗战形势急剧恶化,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共两党可谓精诚合作,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给予敌人沉重

打击,粉碎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抗敌御辱的决心和力量。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成为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平台,吸引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海外华侨在内的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民聚集到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凝聚起磅礴的抗日力量。

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调整侵华政策,其诱降政策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阵营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全面抗战路线,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凝聚更多的抗日力量。针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坚决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尽显中流砥柱作用。在敌后根据地中,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凝聚最广泛的抗战力量,使得统一战线获得坚实的社会支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从国共合作发展为全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广泛政治联盟,为持久战提供了政治保障。

经过14年艰苦抗战,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抗战实践证明了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法宝,这为抗战胜利后应对新的政治局面提供了重要保障,成为构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遵循。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轨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民族觉醒的起点。遗憾的是,这种民族觉醒具有局部性和自发性,士大夫群体中只有屈指可数的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通过著书立说介绍西方,主张“师夷制夷”却反应寥寥,并未引起重视;普通百姓更是毫无察觉。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还是站在“天朝上国”的立场去审视“西洋夷

狄”,他们的觉醒更多是对清政府落后的担忧,而非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继之而起的洋务运动是部分士大夫们将担忧转化为挽救清政府的实际行动,他们未能更不可能跳出“王朝国家”的范畴而上升到“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的认识。这一时期,普通百姓则是“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4]625},也不可能“有‘民族危机’的集体意识”。

1894年甲午战败对中国人的刺激是很大的。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5]249}。甲午战败使“中体西用”的幻想瞬间破灭,民族意识的觉醒阶层范围也迅速扩大,从少数士大夫群体扩大至绅士、知识分子。维新派开始提出“保国、保种、保教”,首次将“国家”和“民族”并列,蕴含“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孙中山则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在“反满”为核心的口号引领下,形成了模糊不清的“中华民族”整体认知。这一时期,尽管有义和团运动,但是其参加者主要是集中在华北地区的农民,全国范围的普通百姓仍然没有被卷入。因此,民族意识的觉醒范围虽有扩大,层次升级,“救亡图存”意识更加明显,但仍然主要局限在知识和精英阶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崭新的共和政体,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挣扎。这一时期,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宣传和革命行动的深入开展,救亡图存的主体进一步扩大,精英主导下的民族意识逐渐走向“国家建构”,士兵、学生更多地加入革命队伍中来。在认知上,也由“驱除鞑虏”发展为“五族共和”,民族意识由“汉族中心”转向“多民族共同体”,但普通民众对“五族共和”的理解还非常模糊,民族意识的觉醒仍然摆脱不了局部性和自发性的桎梏。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的范围由精英阶层转向了城市普通民众,“中华民族”的概念也由模糊变得更加清晰。这次爱国运动,将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提升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目标,他们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取代了王朝臣民的旧有意识,展现了中华

民族前所未有的思想超越和共同行动引发的巨大力量。五四运动在思想和实践层面让更多的国人拥有了“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认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6]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图谋和行径将中华民族推向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华民族自觉完成了一次全国总动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他们不分民族、地域、阶层、党派之别勇敢站出来,同仇敌忾,誓死抗敌,保卫中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从一种越来越多的普遍认同的意识转变为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共同行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催化剂。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7]这种高度就是从局部性和自发性的民族意识发展为全民族全民的共同意识和自觉行动。正是站在近代中国厚重的历史积淀基础上,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催化机制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从“局部”到“全面”的历史转折。

(一) 政治凝聚:统一战线的“包容性”构建共同政治认同

从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其“包容性”的特殊优势,不仅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更使近代以来形成的阶级、地域的割裂与民族的隔阂统统被打破。

统一战线以民族生存为最高宗旨,跨越国内两党分歧,将中华民族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在“民族危亡”面前构建了共同的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主动由“反蒋抗日”调整为“联蒋抗日”，将“苏维埃政权”改为国民党统治下的“特区政府”，将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贯政策，开始“联共抗日”，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民族大义”面前，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国民党的暂时妥协，最终铸就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政治认同，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基础。

为了将这种政治认同转化为更多国人的具体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成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行动纲领。为了抗战胜利，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地域、阶层、职业、身份，都紧密团结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就是这样悄然凝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减租减息”“普选”等政策更是将统一战线的动员力量落到了具体细节，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可感可知，成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纽带。

（二）文化整合：抗战叙事与共同价值的塑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高度重视抗日文化建设。全国文艺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以抗战为叙事题材，通过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和紧扣主题的舆论宣传，起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整合作用，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关键路径。

通过那些通俗的文艺作品，让中华儿女从慷慨激昂的歌曲、发人深省的戏剧、荡气回肠的小说等作品中获得情感共鸣，如歌曲《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无论是农民、学生还是士兵听了之后，都能从情感上获得一种“民族危亡”的共识并产生一种抗争的力量；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为主要代表的舆论宣传阵地，紧扣“守土抗战”为核心主题，广泛呼吁“共赴国难”“抗日救国”，共同喊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样一种上下层广泛呼应、深得民心的文艺作品和宣传形式，正是在不经意间观照了多年以

来中华民族阶层、族群割裂的现实，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整合，让上至义愤填膺的爱国精英，下至目不识丁的农民，都能深切地领悟到“救亡图存”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行动意识得到确认并越来越清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提供了文化根基。

（三）实践锻造：全民族抗战的“共同经历”强化命运共同体认知

14年的浴血抗战同时催化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同胞乃至海外华侨都自觉团结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抗战由最初的局部的、个体分散的抗战到全民族的共同行动，这样的实践过程锻造并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提供了实践基础。

少数民族同胞在日寇铁蹄之下，自发组建了多支抗日武装队伍，着力爱国宣传，以各种方式积极动员后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英勇投身抗日的战场。1938年“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奔赴前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慰劳活动，当时通过大量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掀起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热潮，甚至出现松潘地区少数民族部落武装请缨出战的壮举。“抗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

海外华侨支援抗战也是极尽慷慨，因为“中国人”的共同身份，唤起了无数爱国华侨内心的“民族意识”，他们捐款、捐物、组建抗战组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凝聚海外华侨的精神纽带。

至此，面对外敌入侵，中国人再也不是“熟视而无所容心”的看客，在惨痛的民族灾难面前，全体中华儿女被彻底唤醒，在实践中强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认知，并将这种认知在抗战后期胜利的“集体欢腾”中升华为全民族的情感本能。

（四）思想引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推动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抗日战争时期，这种理论自觉集中体现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指引下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策略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自觉将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和抗战实践紧密结合,系统阐释并构建了“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整体价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理论坐标和实践指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揭示了抗日战争绝不是依靠军事手段就能取胜的,而是靠“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凝聚”,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2]474},只有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将社会各界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等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汇聚强大的“民族共同体”力量,才能争取到最后的抗战胜利。这篇光辉著作,把近代以来此起彼伏碎片式的民族觉醒意识和革命行动升华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向全面和统一。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首次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史,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2]622}。从历史的角度打破了“汉族中心论”,揭示了中华民族不仅刻苦耐劳,同时又富有革命传统,“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2]623},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倒退、分裂甚至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着眼抗战大局,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正确策略,在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的前提下不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统一战线在动态平衡中持续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8]1027}的目标,将“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结合起来,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意识到:抗战胜利不仅是“民族独立”,更是获得“自我解放”的重要契机,再次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推动,完成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发”到“全面自觉”的质变,彻底从思想意识层面结束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在抗日实践中让全国各族人民自觉投身到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统一战线上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最伟大的贡献,是将‘中华民族’从一个模糊的概念,变成了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归属。这种思想引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与实践保障。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标志与历史意义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标志

1. 认知层面:“中华民族”成为超越畛域的普遍认同符号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过程如前所述,其中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惨痛的民族牺牲和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才形成抗日救亡的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才得以确认并强化。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2]447}。这场战争彻底打破了近代以来由于地域、族群的不同而造成的认知局限,如抗战前“中华民族”常常被误解为“汉族”的代称,抗战中,这种认知逐渐统一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认知上,直至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苦难岁月里逐渐升华到“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民族共识。所以才出现了“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松潘地区的少数民族主动请战”、新疆民众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誓与祖国母亲患难与共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必胜的坚强信念”^[9]。各民族都把保卫自己民族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各地方形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在认知上的重要标志。

2. 情感层面:“爱国—爱民族—爱国家”的三位一体融合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亡族灭种的残

暴政策,到处烧杀淫掠,推行“三光”政策,一系列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彻底唤醒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家国情怀,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悲壮也最坚实的根基。抗战过程中的无数牺牲和惨重损失造成的集体创伤以及抗战胜利后的集体荣耀使得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在两个情绪的极端顶点深刻地将个人与国家、小家与大家、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荣辱融合在一起,使个体情感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实现了深度共情,由此将四万万同胞深度绑定在一起,成为最终淹没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成了从认知共识向情感共情的跨越。

3. 实践层面:全民族“为共同体生存而战”的自觉行动

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后在认知上实现了突破,在情感上实现了升华,在实践中就有了全民总动员的集体自觉行动。十四年的抗战中,尤其是全面抗战以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族不分汉满蒙回藏,全国各地各族各界各阶层的同胞共赴国难,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广泛的行动,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抗日战争从最初的东北、华北的局部抗战到全国范围的全面抗战,从少数精英的呼号呐喊到工农商学兵,无论男女老幼都主动抗战的实践主体转换,从抗战前的分散行动、自发行动到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整合,从为“生存抗争”的救亡信念到最后“为民族未来而战”的发展愿景,全体中国人民在抗日的共同实践中凝聚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得以全面觉醒。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伟大历史意义

首先,凝聚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精神动能。抗日战争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正是这样的牺牲唤醒了全体国人,凝聚了强大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动能。

其次,奠定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基础。抗战中全面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厚重历史为依托,以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为基础,是以“国家之名”的民族共同体,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有了主心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核心,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更加紧密,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无论内外环境如何变化,都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惧风雨,直面未来。

再次,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强调“民族平等与团结”,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同时,又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最后,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旦全面觉醒,就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成了一种“众志成城”的力量,而且这是一种始终维护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力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力量成为恢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持久动力。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三线建设”;无论是支援建设边疆,还是“两弹一星”,无不延续着“中华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认知和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是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砥砺前行,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实现共同目标不懈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抗日战争锻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10]

总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中华民族生存大局出发,充分认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正确地位,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团结凝聚了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构建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最高政治共同体的认知框架;以“各民族文化整合”搭建集体记忆,通过多样文艺形式和舆论宣传,将“救亡图存”升华为全民族的精神共识;以“无处不在的实践参与”浇筑

命运共同体,在血与火的抗争中形成了“生死与共”的生存体验,使“中华民族”由模糊抽象变得清晰具体。政治整合、文化塑造和实践锻造形成的协同力量深刻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局部自发”迈向“全面自觉”的历史生成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和实践策略实现了这样的质变。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1).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6]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1).
- [7]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3(1).
-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赵海霞.全面的觉醒:抗战时期新疆各民族国家认同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3):138-146+216.
- [10]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5年9月3日)[J].党的文献,2025(4):3-4.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6页)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全球生态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总之,新时代生态文明系统观念是由自然生态系统论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组成。自然生态系统论揭示了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层次关系、环境属性与发展逻辑,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政策体系的整体协同与若干重大关系的辩证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的系统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与具体化发展,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4]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6] 沈湘平.读懂坚持系统观念[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
- [7] 习近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8] 苗东升.论系统思维(六):重在把握系统的整体涌现性[J].系统科学学报,2006(1):1-5+81.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习近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J].求是,2023(22):4-7.

(责任编辑 王遐见)